

##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 —基于文化属性的思考—

陈红娟<sup>1</sup>

#### 摘要

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以及传统文化自身内在的作用力和强大影响力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历时性研究方面抽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进步性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共时性研究方面融合世界文化之精华进行综合创新；文化的社会性和文化自身结构的独立性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当下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只有通过历时、共时和现时三个维度的合理建构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有机结构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向导和支撑。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现代化、维度、文化属性

21世纪的历史进程让所有文化都共同面临着一个命题：如何避免自身传统与历史的断裂性变迁，如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建构日趋紧迫，似乎要求所有的文化都以割断自身文化的“精神链条”为代价，去迎合现代化的逻辑。依据现代化的特征与需求，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现实处境和普世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方略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盛行于当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分别以“全盘西化”、“中体西用”和“综合创新”为基本文化主张。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亦或是西方文化本位论，都无法超越“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

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品格。然，文化现代化问题涉及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诸多复杂因素，具有多维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综合中西文化之长颇为混沌，笔者在此基础上呼应全球社会文化分化与整合的现实逻辑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三个维度以明晰中国文化发展路向。

#### I. 历时维度：抽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来看，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构建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就历史性而言，费孝通先生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的历史性进行过论述[1] (P393)：一群社会人互相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

精神的，或说包括他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观，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一种文化的存在总是有其历史性因素的沉积，不管它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是否能经得起社会现实的冲刷，它总是在对先辈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传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许多文化研究也表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建构。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2]（P429），一个社会要想从他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传统文化的基础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历史血液灌输，需要与历史相承接，特别是占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所包含的“理性之转化”和“道德的动力”[3]等蕴含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此外，传统文化中可以借鉴的并非只有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都可以借鉴和运用，如法家、农家、阴阳家、道家等，当前中国社会所倡导的理念在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如和谐。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屹立于民族之林，凸显本土色彩的必然举措。

文化还具有民族性。人类群体为适应其生存环境，从一开始就各自发展出一套自己独有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等。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经过历史沉淀，逐步积累形成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文化的民族性能够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基本特质，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并能够反映

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精神。它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内容和精神，与民族存亡共始终。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其民族性，任何文化形态的建构都离不开自己的民族文化。最近几年来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更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2]

（P429）：今天世界上最讲求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应该以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为重要内容，注重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传统文化自身内在的作用力和强大影响力决定其必然成为文化现代化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学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2]（P242）。“传统”是由“传”和“统”两个字构成的。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活的东西。横向曰“统”，指空间上具有权威性的东西，是空间意义上时时刻刻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是传统的重要方面，它是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超物质形式的，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任凭外来文化和社会现实冲击、洗刷、沉落、烤炼而不改其宗的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是历史与现实同化而又异化的产物，具有过去性和现代性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包涵历史上每个时代的文化事项，是历史文化的总体综合，它具有深厚历史的沉淀；另一方面，它影响现实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对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强大控制、影响和作用力。传统文化具有延续的规范力量，让人们形成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和潜意识，并转化为有形的行为模式。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其价值系统，内容带有根本性，是人们生活的原则和心灵向上的依附。余英时就曾写道[2]（P9）：传统的价值系统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

“搏之不得”，但确实存在，而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系统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它有具有超强的稳定结构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强大机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形态又不断自我调整。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拿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来说，在“五四”时期遭到淋漓尽致的批判，但“新儒家”和“国学”的兴起足以说明它依然受着众多国人的“青睐”。可见，传统文化已“侵入”我们的血肉、骨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一维度，防止其在与异质文化的强烈碰撞中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

在继承过程中需要注意：一、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继承，而是继承其中优秀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直线的系统，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包罗万象的系统，其中必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内容，也有很多消极落后的因素，既有丰富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东西，也沉淀了大量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封建残余的东西。一方面，要批判并抛弃那些传统文化中极端残酷落后愚昧的内容，如古代的人殉制度、炮烙制度、凌迟制度、以及一夫多妻制、妇女裹小脚等。另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历史地辩证地廓清传统文化中“良”“莠”，特别是思想和观念层中那些模糊和难以界定的部分。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具体继承而是“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法”是学界人士对冯友兰先生相关思想概括出的[4]。这一思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区分为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就具体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有关，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殊相”，因此应当抛弃；就抽象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无关，反映的是人类文化建设的“共相”，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应当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

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了解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继承传统，缔造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之一。总之，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切忌简单笼统的继承。

## II. 共时性研究：融合世界优秀文化之精华

从文化的时代性和对文化进步性的要求来看，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其对世界优秀文化精华的融合。

这是文化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与自然物一样是一种动态性存在，是静与动的统一，是变与不变统一，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在保存自身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不断重构自身。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文化的时代性集中地表现为各个民族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和历史性，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和精神的基础。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别决定了文化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迁，每一个时代文化事象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望，有不同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哲学、自然科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因此也有了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之别，这种差别都是由社会制度的演变决定的。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文化的时代特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壁垒逐步被打破，出现了越出一个国家和民族范围的时代概念，如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等等，它对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全球化进程

的演进，各民族相互作用的加强和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出现，赋予了文化时代性以新的内涵。文化的时代性不仅仅决定于社会形态，也与世界文化的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文化的时代性说明：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内容和特征，每一种文化的建构既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也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背。世界文化成为文化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文化的发展是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自身的逐步演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一样，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自发展，只有与世界接轨才能与时代相衔接，才不致固步自封，不致作茧自缚。

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进步性的必然要求。文化的进步性不同于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表明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而文化的进步性表明这种文化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社会进步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帝国主义思潮以及它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等。文化的进步性不仅仅体现在先进文化上，任何一种指导社会现实的文化形态都应该具有进步性，这样才能保证其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滞后作用。而且，从文化进步性的取向性来分析，世界文化虽然纷繁复杂，但其中确实含有需要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东西特别是现代化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中那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并起到过先进的引导作用的因素。我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化已经高度发达，并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时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迟发展效应”和历史错位使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中国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这种现状就使我国现代化注定要受到各种外来变量影响与干扰，也迫使我们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而焦虑。在这种外来变量因素成

为必然的情况下，与其坐以待毙等待着在文化领域内再次“被动的解放”，不如在有内在逻辑性的自主建构，积极进取主动融合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使文化效果的力度和向度在悄然之间达到一种理性状态，为我国现代化过程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现实引导力。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文化现代化应放宽视野，积极吸纳世界文化中“向上”和“进步”的文化基因。

当然这种将文化进步性与世界文化相联系并不等于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变向认同而是对起源于封建社会的前现代文化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正当性的一种正视，对进步性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种认可，其实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牵制或减少中国现代化建设外源性文化因素负面影响的一种需要。在融合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融合世界文化中的精华而并不是全部。世界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西方文化而言，其对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人的价值的重视等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值得吸收和借鉴的。但西方文化中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糟粕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宗旨相违背，不足于取，应予以抛弃。二、防止民族性的缺失，建立有效的融合机制。与世界性相对应的是本土性，过多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过激地吸收和容纳容易导致自我民族性的缺失，以致偏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初衷。融合世界文化，并不等于民族文化的弱化，相反合理而有效的融合机制和自我调节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强化，也有益于本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熔铸。三、融合并不等于简单的拼凑和堆积，而是在于综合性创新。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首次明确的提出了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硬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

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分析和审慎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5](P326)。融合世界文化之精华亦也同时要综合创新，在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借鉴外来先进文化，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一种既体现民族，又体现时代性的中国文化。

### III. 现时性研究：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从文化的社会性来看，文化对社会具有依附性，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基础。从文化结构来看，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的建构有其自身严密的结构体系。因此，文化现代化发展应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文化的社会性要求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文化具有社会性。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具体的文化内容）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该说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共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创造出来，日积月累，一代代人在自然打交道中形成。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众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不再属于任何个体。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1]（P392）。也就是说从文化生成角度来看，文化生成于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人与人接触过程中集体智慧和本质力量的升华，文化的构建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社

会基础。马克思就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6]（P7）。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包含着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它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社会力量、社会财富和社会关系所达到的程度。从文化的终极目标看，文化就是要规范、处理、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人们因思想、信念、行为、利益的冲突产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达至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标志和准绳。文化不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脱离的东西，而是与之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之中” [7]（P694）。文化都因为有社会关系这一核心价值 and 内涵而成其为文化，成为有公认或有公信力的文化，并形成独特的规则和规范的文化或伦理道德文化，任何远离此核心的文化只能呈昙花一现之势。而且从文化的时代性也可以看出，每一种文化状态都有其时代规定性，而这种时代规定性正是孕育于当时的社会形态之中。因此，文化最终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其终极指向也必须回归社会这一现实。

文化结构的独立性要求文化自身建构严密的系统。当然，文化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依附并不代表其自身建构的缺失，相反正是通过文化自身体系的建构才能达到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观照。因此，要正视文化自身体系的建构。从文化的生成和终极目标来看，文化是具有社会性，但就文化自身而言，它又具有系统的特点，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既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解析，也不是互不关联的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个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由许多复杂元素组成的系统，它是一种层次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的整合，它本身可进行分层、肢解和理性的诠释。文化系统的新陈代谢，固然要靠文化要素的增减损益，但根本的改造的途径在于旧系统结构的消解和新系统的重构。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

固然与构成其组成部分要素的流失和弱化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内在消解和弱化,其结构的不合理性和错乱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肯定。文化可以在客观的物质条件所限制的范围内给予经济基础以重大影响,因为在此范围内,构成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仍可选择,而文化则以各种方式对人们的选择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引导某些选择而排除另一些选择。从文化系统的源构来看,它来源于社会结构有机系统的作用。社会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系统,具有高度的自我组织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自我组织系统能力,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有机系统的自觉性、意识性。文化就是社会有机系统进行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文化并不是各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的简单加和,而是一种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意识。由于它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动都有规范作用和导向作用,从而也就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总体性的自我意识而能够对整个系统进行调节、控制,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首先,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明确其服务对象和终极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些性质和特点,不同程度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也要求这些理念以各种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完善文化自身的结构体系。总的来说,文化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即文化产品、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产品”是文化系统的表层,它是文化系统的“果实”,是文化系统中的可见性因素。文化活动方式是文化系统的中层,

人们掌握一种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学习和继承特定的活动方式。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表现出的文化观念是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要建构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体系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各个方面调节,完善文化体系。第三,实现文化自身体系的独立性与文化对社会的依附性之间的统一。其实二者是统一的,文化自身建构虽然自成体系但其终极指向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依附性也有益于自身系统进一步的完善。当然,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只是理论上的论证和口头上的简单宣扬,而要借助于文化产品,制度规范,社会成员的活动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塑造等各种“外力”来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一种潜意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社会成员“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取向。也正是通过文化与社会之间“内在凝聚力”与“外在助推力”的结合,文化理念才能呈伞状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层层相扣,处处相依,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

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自我定位的不可或缺的坐标,现时性维度的定位则是其落脚点,也是坐标的原点。历时性研究强调的是文化的续承性与创新性,共时性研究强调的是文化的融合性和借鉴性,现时性研究则更强调的是文化自身的指向性和体系性。历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古与今,解决的是文化的继承与传递问题;共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中与西,解决的是文化的学习与借鉴问题;现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虚与实,解决的是文化的导向与现实契合问题。这样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才能在时间、空间与实践三个维度上完善自身有机的结构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向导和理论支撑。

#### 注释\*

<sup>1</sup>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 年版.
- [2]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 [3] 金耀基: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韦伯学说的重探》, 刊于乔健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社会研究所 1995 年出版.
- [3]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 [4] 吴传启先生在《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载《哲学研究》1958 年第 2 期) 中将冯友兰的相关思想概括为“抽象继承法”, 并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支持.
- [5]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7]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